

“游”的下行与“文”的上升

——论东汉士人流动的下行趋势及其文章史意义

杨 霞*

【摘 要】 东汉士人的流动相对战国、西汉时期的士人流动呈现出“下行”趋势,具体表现为游学群体的“平民化”、游学地点的“民间化”和游学目的的“俗世化”。士人流动、士人流动的“下行”促成了文章写作群体的生成与文章体裁的新变,并带来了东汉文章写作的繁荣。伴随着大量士人的流动与写作群体的生成,非实用类文章也日渐增多,表现为文章抒情功能的提升。后世所言的真正的“文学”这一意识形态,日益脱离史学、经学而走向自觉与独立,最终促成了“文”的上升。

【关键词】 东汉士人;流动;下行;文章史;上升

流动是中国古代士人的重要特征,“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论语·宪问》)。受大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各期士人的流动形成不同的特质。即以先秦、汉代、唐代这三个时期士人流动为例,就可依次总结出善游说、重游学、喜漫游的三个阶段性特征。其中,汉代士人的游学依然呈现出贵族子弟生源、朝向京都、学优则仕的主流倾向,然而在主流之外,细致观察,东汉士人的游学相对西汉而言又具有某种“下行”趋势,表现为平民化、民间化与世俗化倾向,显示出更广泛的民众基础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趋势虽非主流,却静水流深,指引着事物积极发展的方向。因此,本篇将着重对东汉士人在流动中尤其是游学中所表现出的“下行”趋势作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汉代士人之流动可大致分为游学、游宦、游观三类。士人流动的最初行为多为游学,游宦、游观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对游学者身份的考察基本可以或大部分涵盖游宦者、游观者的身份。因此,未免太过枝蔓,本篇将着重以士人之游学为研究领域进行考察。又,东汉文章写作较为久远,很难界定某一篇文章或某一类文字具体作于某士人游学还是游宦亦或游观之时,因此,凡是有过游历经历的士人,其文章都将纳入考察范围,并据此对与“下行”趋势相伴而生(或稍稍滞后)的文章写作领域的“上升”表现作一文章史层面的探讨。

* 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230039。

一、东汉士人流动的“下行”趋势

（一）游学群体的“平民化”

东汉时期,士人无论出身、贫富,只要自身经济条件许可,都可被人举荐或自发游学。这一宽松政策使得更多士子步入游学行列。

太学作为最高学府汇聚了各地的游学之士。西汉武帝初起太学并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太学生逐渐增多,至元帝时有一千人,成帝时期更发展为三千人规模。东汉士人游学风气更甚,太学一度“至三万余生”(《后汉书儒林外传》^①)。同时期,求学于州郡官学者也络绎不绝。如,刘梁为北新城长,“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刘梁传》);张霸任会稽太守,“立文学,学徒以千数”^②;冯颢为令时,“立文学,学徒八百人”^③。从班固《东都赋》所描写的“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的景象也可以想见其时地方官学的兴盛景象。

私学也是士人游学的重要场所。士人“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④东汉见于史籍中的私学大师有一百余位(而西汉只有十余位)。^⑤这些大师名下士子数量不一,有授徒百余人者,如陈留边韶、犍为董钧、扶风法真、琅琊伏湛、沛郡桓典、北海郎顗、安定李恂、汝南廖扶、扶风鲁丕、北海甄承等;另有生徒以千计者,如济阴曹曾、山阳丁恭、彭城姜肱、南阳樊儵、任城魏应、陈留楼望等;更有乐安牟长、颍川张兴、汝南蔡玄等私学大师,其门下著录弟子达到万余。

数量如此庞大的游学之士,不可能尽是家境富足、条件优渥的中上层弟子,其中就有不少弃官游学的郡中小吏和出身贫寒的平民子弟。仅《后汉书》记载的弃官游学之郡吏就有:蜀郡杨终“年十三,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杨终传》);汝南周防“年十六,仕郡小吏,……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经明举孝廉,拜郎中”(《周防传》);陈留范冉“少为县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邮。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阳受业于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范冉传》);辽西公孙瓒“为郡小吏。……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缙氏山中,略见《书》、《传》”(《公孙瓒传》)。

又有更多平民弟加入游学群体。早在西汉时期,太学生中就有倪宽、匡衡、翟方进等“饥寒远客”。到了东汉,家境贫寒的子弟更是屡见不鲜。王充游学洛阳期间,因家贫无书而时常流连书肆间;郭泰“家贫,初欲游学,无资,就姊夫贷五千金”,从师受业后,“并日而食,衣不蔽形”。^⑥更有士人以各种佣作方式谋取生存与游学之资:沛郡桓荣,少学长安,“贫窶无资,常客佣以自给”(《桓荣传》);北海公沙穆,“为祐赁舂”(《吴祐传》);河内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卫飒传》);汉中李郃,“居贫而不好治产……至京师学问,常以赁书自给”^⑦;敦煌侯瑾,“恒佣作为资,暮还辄焚柴以读书”(《侯瑾传》);陈留申屠蟠,“家贫,佣为漆工”(《申屠蟠传》);南阳孔嵩,“家贫,佣为新野阿里街卒”^⑧;会稽闾泽,“家世农夫”,“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三国志·吴书·闾泽传》)。

可以说,正是上述下层官吏和贫寒子弟的向学与游学,为东汉时期庞大的游学士人群体注入了

^①以下引文,若无特别标注,则皆出自《后汉书》。

^②常璩:《华阳国志》卷十《蜀郡士女》,严茜子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133页。

^③《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第34页。

^④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六“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296页。

^⑤可参见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⑥李昉:《太平御览》卷四八五《人事部》引《郭林宗别传》,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221页。

^⑦《太平御览》卷四八五《人事部》引《李郃别传》,第2221页。

^⑧《太平御览》卷八二九《资产部》引华峤《后汉书》,第3697页。

新的“平民化”的质素。

（二）游学地点的“民间化”

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士无定主。绝大多数士人带着游说君主整顿时局的政治目的向政治中心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秦国咸阳、楚国郢等地迁移。西汉士人的流动多集中于长安所在的三辅地区。东汉士人虽有朝向京都洛阳的辐辏,但统观整个东汉一朝,除去洛阳太学和州郡学校,很多经师选择了更为“民间”的地域进行教学,可分为居家教授和隐居教授两种。

居家教授者大致有:琅琊承宫、广汉任安、颍川张兴、犍为杜抚、巴郡杨仁、豫章程曾、豫章唐檀、广汉董扶、颍川李膺、会稽王充、汝南周磐、太原郭太、安定李恂、彭城姜肱、扶风韦彪、陈留吴祐、南阳延笃、扶风法真。这些经师大多少时离乡游学,学成则还乡教授。他们的游学经历为当地士人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经师声名远播,又招致了异地学子自远而至,如此更促进了民间的学术文化交流。

还有一部分经师选择了避地(隐居)教授。避于山林者有:南阳樊英隐于壶山之阳、北海公沙穆隐居东莱山、太原刘茂避世弘农山、赵康隐于武当山、京兆冯豹隐于丽山下、南阳高凤授业于西唐山;避于大泽者有:会稽包咸长住东海;济阴孙期、陈留杨伦讲授大泽;北海郎顗隐居海畔。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而“师之所存”,正是士子所往之地也。这些名师、学者的避地、隐居教授,引得众多学子纷纷做朝向大师故里、隐居地的流动。《后汉书》记录有为数不少的士人“自远而至”、负笈而来,其间不乏著名学者辗转民间、求师问学的行迹。如会稽顾奉赴豫章师从程曾;河南郑众、扶风贾逵至南山受学于杜子春;挚恂隐于南山,马融从其游学;更有北海郑玄“以山东无足问者,乃入西关”,(《郑玄传》)与卢植一并师从扶风马融。

对上述经师教学处所稍加细观可知,东汉时期士人游学之地除京都洛阳外,在各州郡又多有分布,尤以颍川、豫章、广汉、会稽、扶风、陈留、南阳、北海最为集中,并逐渐形成故土、京师、山泽、市镇的多重流动。而这种分布于各地的士人流动也应是东汉士人流动之“下行”趋势的重要表现。

（三）游学目的的“俗世化”

上述经师无论家居授徒还是避世而教,他们的选择(当然也有不得不返回故里的被迫选择,如党锢对士人的禁锢)本身就意味着远离政治中心、行于民间的路线。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多士子的游学目的也朝着“俗世化”方向发展。这里的“俗世化”指士人的游学目的由庙堂之高转向江湖之远。他们开始更多地将学习视为目的,而非进入仕途的“他山之石”。

首先,黄老之学、天文历法、法律、医学等非儒学知识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精于黄老之学者,有“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杨厚传》)的杨厚;以医学教授者,有华佗“精于方药。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陀学”(《华佗传》);以律法教授者,有郭躬“少传父业(父弘,习《小杜律》),讲授徒众常数百人”(《郭躬传》);以天文、占星、图讖授徒者,如樊英“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樊英传》),唐檀“好灾异星占,后还乡里,教授常数百人”(《唐檀传》),董扶“学图讖,还家教授,弟子自远而至”(《董扶传》),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姜肱传》);还有以诗律教授门徒者,如钟皓“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钟皓传》)。这些非儒学知识的学习远不如博通经传以拾青紫的效用之大,但为数不少的士子还是选择了对这些知识的接受与传承。这种现象也从侧面解释了东汉中后期经书繁杂、章句渐疏引致的另一种结果:即已有士人从日益沉重的高大上之经书中日益解脱出来,选择了颇接地气的另一类文化知识。这种接地气或许也是东汉流动士人的“下行”趋势的一种结果,也可以算作是一种表现。

其次,在学习内容多样化的同时,士人也开始注重转益多师。班固“博冠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班固传》);马融先后师于挚恂、班昭;张衡先游于三辅,后入京师,“观太学,通五经、贯六

艺”(《张衡传》);任安,先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后从杨厚学图讖,穷极其术;北海郑玄,先后师从第五元先、张恭祖、马融;延笃,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后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会稽魏朗,先从博士郤仲信学《春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服虔少入太学受业,后听闻崔烈集门生讲学,便隐匿姓名,窃听门墙之外;董扶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后师从杨厚,穷极图讖,再至京师,游览太学;汉中祝龟先后游于汝颖地区及洛阳太学。士人转益多师,遂博通诸学,马融、郑玄这样集诸经之所成的鸿儒也就应时而生了。

再次,东汉时期出现了这样一批为学习而学习的士人。他们不再汲汲于富贵功名的获得,相反投入大量时间用于各种知识的习得。如:豫章程曾受业长安达十余年;广汉段恭,“周流七十余郡,求师受学,经三十年。”^①陈留范冉“从英贤游学十三年”^②;汉中李固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会稽赵晔至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赵晔传》)

最后,部分士人在游学中将对外在功名的追逐转至于对内在素养的提高,又转至于对乡里、治下乃至暂居地的礼化。如:汝南蔡衍“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蔡衍传》);鲁国曹褒“初举,再迁圉令,以礼理人,以德化俗”(《曹褒传》);北海管宁少与平原华歆、乡人邴原游学异地,后避乱辽东,“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礼让移于海表”(《三国志·魏书·管宁传》)。

以上是东汉士人流动“下行”趋势的具体表现。这一趋势的生成,是诸多因素使然。士人游学的“平民化”趋向与当时统治者大力推行依经取士的国策有关,“民间化”、“俗世化”倾向则更多源于东汉后期不良政治、不良政治导致的仕途堵塞。其时“当涂之人,既不能昭练贤鄙,却又却于贵人之风指,胁以权势之属托,请谒填门,礼赞辐辏……此正士之所独蔽,而群邪之所党进也。”(《潜夫论·本政》)不良政治使得士人失望于现实,转而主动投身民间、投至学习本身。而无论主动、被动,士人辗转各地游学以及学成不仕、潜行乡里的结果都使得这一时期士人流动呈现出“下行”趋势。

二、士人流动、“下行”与东汉文章的繁荣

东汉士人流动、“下行”趋势所引起的文章写作层面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于写作群体生成与文章体裁新变两个层面,并最终带来了东汉文章尤其是东汉后期文章写作的繁荣(本文的“文章”外延宽泛,包括“经史子集”文献)。正如章学诚所言:“自东京以降,迄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文史通义》)

(一) 写作群体生成

大规模、各地域间的士人流动带来了文章写作群体的出现。相对于传统的个体文人、宫廷文人而言,这一写作群体具有集团性、区域性的特征。

1. 官方机构写作群体。这一群体多置身兰台、东观、鸿都等中央机构。其中,兰台、东观写作群体以修史为主。如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在兰台共同写成《世祖本纪》;李尤被贾逵推荐,在兰台“受诏与刘珍等撰《汉纪》”^③;马严移居洛阳后被明帝召见,“有诏留仁寿阁,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马严传》);“卢植、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补续《汉纪》”(《卢植传》)。相比较,鸿都门集中了大量“能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灵帝纪》),其中可考者有乐松、任芝、贾护、江览、郗俭、梁鹄、师宜官,惜作品不存。根据《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载“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

^①《华阳国志》卷十《广汉士女》,第146页。

^②李昉:《太平广记》卷三一六《范丹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503页。

^③徐天麟:《东汉会要》卷十二《文学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9页。

书,开鸿都之赋”一语,可推测鸿都门人多为赋作。

又有效命于外戚幕府和地方势力的写作群体。东汉幕府文人有如窦宪幕府的傅毅、班固、崔骃,邓骘幕府的马融、杨震、陈禅,梁商幕府的李固、陈龟、周举,何进幕府的王谦、刘表等人。^① 地方文人集团以汉末荆州襄阳刘表集团(王粲、繁钦、宋忠、邯郸淳)和邳城曹氏集团(建安七子、杨修、吴质)为代表。这些依附于将军幕府或军阀集团的士人或撰写文书以参谋军政、或撰写诗赋以歌颂主德。同时,彼此间也时常讲经立说,互通有无,促进了文章写作的发展。

上述写作于中央、幕府、地方的士人又多在这几处穿插流动。如班固曾为兰台令史,也做过窦宪幕僚;刘表曾是何进幕府掾吏,又是荆州官学的领袖人物;王粲先后依附襄阳刘表与邳城曹操两个集团。这种流动与外戚、君主权力相颀颀,与中央、地方势力消长以及士人的政治判断有关。同时,这些不同等级机构的存在也为这一士人群体提供了更多流动的机会。

2. 自发形成的写作群体。这一群体主要有师生群和朋友群两大主体。他们或因师承关系、或因意气相投而著述相类。

师生圈的写作有:贾逵遍注《易》、《书》、《诗》、《礼》、《春秋》,其弟子许慎亦有《五经通义》、《五经异义》,有“《五经》无双许叔重”的盛誉。郑玄、卢植师从马融,马融有《易传》,郑玄有《易注》;马融有《礼记马氏注》,郑玄有“三礼”、《三礼图》,卢植有《礼记卢氏注》;马融有《春秋三传异同说》,郑玄有《春秋公羊传郑氏义》、《春秋左传郑氏义》。另有延笃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后又受学于马融,著有《春秋左氏传延氏注》。

在游学中相识并结为好友的朋友群的写作:东汉中期张衡、马融、崔瑗皆游学洛阳,彼此交好,常同题写作。张衡作《七辨》、《南阳文学儒林书赞》、《大司农鲍德诛》,崔瑗作《七厉》、《南阳文学颂》、《司农卿鲍德诛》;张衡作《论举孝廉疏》,崔瑗作《上言察举孝廉》;张衡研究《太玄经》并致信崔瑗,崔瑗遂作《太玄经》;马融作《七广》,崔瑗作《七苏》;崔瑗作《遗令子裳》,马融亦有《遗令》。基于志同道合而形成的这一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又多有书信文、赠答诗的写作,又有相互荐引的荐文、悼念朋友的碑文等。需要注意的是,在官方机构中也存有师生、朋友这两种关系。如曹氏父子与建安诸子间就是幕主、幕僚的关系,同时彼此间也有惺惺相惜的朋友之情。

3. 薪火相传的家族写作群体。有数代游学、文章蔚为大观的家族写作群体。扶风班氏以著述《汉书》享誉其时与后世:班彪从小与兄班嗣游学不辍,才名渐显;班固十六岁入太学,博贯载籍,穷究百家之言;班彪子班超、女班昭,班超子班勇也有作品传世。又有“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的涿郡崔氏家族:崔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崔瑗“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崔寔“少沉静,好典籍”,后至洛阳“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崔骃列传》);崔琦为崔瑗从兄,“少游学京师,以文章博通称”(《崔琦传》)。崔氏著述丰富:崔骃有集十卷,崔瑗有集六卷,崔琦有集一卷,崔寔有集二卷、《政论》六卷、《四民月令》一卷。其他还有汝南应氏(应劭、应瑒、应璩)、沛郡桓氏(桓荣、桓郁、桓麟、桓彬)、汝南袁氏(袁安、袁闳、袁绍、袁术)、江夏黄氏(黄香、黄琼、黄琬)、颍川荀氏(荀爽、荀悦、荀彧、荀攸、荀采)等家族。

这些家学深厚的士子幼年时多由父辈启蒙,在成年后大多继续游历四方,转益多师,遂又融入新的朋友圈、同僚圈,并大力写文章,共同促成东汉文章的繁荣景象。

(二) 文体新变

东汉文章在西汉文章基础上继续发展。伴随士人流动,很多既有文体的写作日渐增多,如书信、

^①已有学者对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文章写作进行了深入分析,此不赘述。可参见吴从祥《汉代幕府文人及其文学活动》,《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荐书、赠答诗文的兴起。同时,在新环境的影响下,有些文体还发生了变化,更有些新文体得以出现,终至“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①。

1. 郡书、地志出现。士人分散于各地,各区域风土人情的差异引起了士人的注意,也带来了东汉地域文章写作的勃兴,主要表现为郡书与地志的私家撰述。郡书代表作有《三辅决录》、《陈留耆旧传》、《兖州先贤传》(亦名《山阳先贤传》),作者分别为赵岐、圈称、仲长统;地志表现为杨孚《异物志》的成书。从士人流动的角度来看,郡书、地志的出现正是士人在长期流动中所形成的区域意识在文章写作领域内的反映。这种意识在班固《汉书》中已有端倪,但班固是着眼于全国大局而进行的各地区风土人情的描述,而《三辅决录》、《陈留耆旧传》、《兖州先贤传》则分别根基于三辅、陈留、兖州地区,是有意识地对局部区域进行的归总。《隋志》史部地理类序针对当时地志的修撰评价道:“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②可见,当时私人撰修地志,并不是要在地理学上有所建树,也不是着眼国计民生,而只是“因其经历”,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撰文成篇。

2. 赋体流变。士人的流动也带来了赋体的流变,表现为都邑赋和纪行赋的写作。东汉初期士人在旧都长安与新都洛阳间的流动导致了都邑赋的大量写作,且描述对象由京都扩展至郡国。关于京都的赋作有杜笃《论都赋》、班固《两都赋》、崔骃《反都赋》、傅毅《洛都赋》、张衡《两京赋》等,有关郡国的赋作有如班彪《冀州赋》、张衡《南都赋》、徐干《齐都赋》、刘桢《鲁都赋》等。这些赋作一方面延续了西汉大赋的铺陈手法和主客问答格局,同时,相对西汉赋作的夸饰而言又呈现出写实的趋势与特点。例如,“班固的《两都赋》,由宫廷而扩大到京都。张衡的《二京赋》,则又由京都的上层生活转而关注市井文化生活的层面”^③。这种自庙堂而至民间的视野转变,与班固、张衡两位作者的多方游历是分不开的。又有纪行赋的写作。纪行赋的开篇之作当属西汉末刘歆的《遂初赋》,创作高峰期则在东汉。班彪《北征赋》记录了作者离开长安、避乱天水的行程;班昭《东征赋》是随子远赴陈留时所作;蔡邕《述行赋》乃其被迫应召入京未至而归“心郁悒而愤思”之作。这类赋作,都有较为明晰的行程路线作为文章主线,在空间转移中记录着外在景物与内在心态的变化。此外,这些赋作多写于作者流迁之时,整体基调显得较为悲苦。

3. 诗歌句式变化。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兴起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事件。五言腾踊并日益取代早期摹仿《诗经》、《楚辞》而作的四言诗与骚体诗。班固《咏史》、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诗》、《古诗十九首》是这一时期五言诗代表作。由重四言、骚体转向对五言句式的喜爱,这不仅是诗歌自身句法结构的复杂化和语言功能的扩展所致,^④也是士人潜行民间,不断受民间文学尤其是乐府民歌影响的结果。正因为士人流动的下行,使得“民间的文学因此有机会通文人接触,文人从此不能不受民歌的影响”,“有时因为文学上的冲动,文人忍不住要模仿民歌,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往往带着平民化的趋势。”^⑤同时,这一时期七言诗写作也活跃起来。相对先前四言诗之铿锵有力、言之凿凿,蜿蜒之七言句式更利于士人书写情怀,以张衡《四愁诗》、曹丕《燕歌行》最为有名。

三、“文”的上升

“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有益世事的“实用”功能是中国早期文章

^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之《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②魏征:《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8页。

^③陈庆元:《赋:时代投影与体制演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④可参见赵敏俐《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句法结构与语言功能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

^⑤胡适:《白话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的重要特征。伴随着东汉大量士人的流动与写作群体的生成,这一时期的文章的“实用”价值得到了更充分的认可与展现,巡颂类、赠答类、书信类(包括荐书)、地志类文章等都在此期得以出现或发展。文章之士的地位也得到提升,如灵帝设鸿都门学,“能为尺牍辞赋”者受到青睐;曹氏父子雅爱诗章,建安诸子即常伴左右。同时,非实用类文章也日渐增多,表现为文章抒情功能的提升,后世所言的真正的“文学”(思想性、艺术性、欣赏性的完美统一)这一意识形态日益脱离史学、经学而走向自觉与独立,最终促成了“文”的上升。

(一) 文章抒情功能的提升

文章审美价值的重要体现是情感的融入,即文章抒情性的提升。“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古诗十九首》),东汉士人在游历中渐渐发现个体的微小,个体小我的情绪也渐渐融于文章之中。

首先是对故土的留恋。班彪感“遭世之颠覆兮,旧室灭以丘墟”,发出“我独罹此百殃”的诘问(《北征赋》);班昭远赴陈留,亦因“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恨而怀悲”(《东征赋》);王粲于战乱之际不得不“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七哀诗》),然而荆蛮之地本非故乡,“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登楼赋》)浓浓的乡土情结与被迫远行的忧伤通过文字得以展现。

其次是对家人、朋友的思念之情。秦嘉与妻子徐淑分别则“愁思难为数”(《赠妇诗》),与朋友高恢分别则“念高子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爰集兹”(《思友诗》)。享有“五言之冠冕”美誉的《古诗十九首》更是充斥了游子与家人的离殇。张奂作书于延笃,开篇即言“唯别三年,无一日之忘”,结语又曰“聋盲日甚,气力寝衰,神邪当复相见者,从此辞矣!”(《与延笃书》)延笃亦是“离别三年,梦想言念,何日有违。伯英来,惠书盈四纸,读之三复。”(《答张奂书》)二人的相惜之情清晰可见。孔融担心好友盛宪的处境,感叹“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论盛孝章书》),充满怜惜之情。

再有,士人在游历中凭吊古迹、感叹现实、兼抒发不遇之情。冯衍游历山水、瞻仰旧居名都,痛感“群后之不祀兮,痛列国之为墟”(《显志赋》),抒写半生不遇、志不获骋的落寞;在其《扬节赋》中更决意“耕于骊山之阿,渭水之阴。废吊问之礼,绝游宦之路”。梁竦“坐兄松事,与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历江、湖、济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骚赋》”(《梁竦传》)。其他又有个体不遇之悲的抒发,如梁鸿“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渴望“冀异州兮尚贤”(《适吴诗》)。更有《古诗十九首》中“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的伤痛。

这些情感不是忧国忧民的大情怀,而是士人身在旅途孤独、苦闷、思乡、相思的“小我”情绪。这些个体情感的融入使作品更加真实、感人,直指心灵,被后人共鸣之。

(二) 文学的日益独立

士人具有抒情功能作品的涌现使文学的本质得以展现,文学也由此走向自觉、独立的时期。理解这一“独立”也可从文、史、哲三者的关系说起:文、史、哲融合不分是早期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三者间区别可大致概括为史学求真、哲学(在汉代主要是经学)求善,而文学求美。

相对于史学注重秉笔直书的特性而言,文学想象在此期得以展现。黑格尔认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力”;^①“艺术作品的源泉是想象的自由的活动,而想象就连在随意创造形象时也比自然较自由。艺术不仅可以利用自然界丰富多彩的形形色色,而且还可以用创造的想象自己去另外创造无穷无尽的形象。”^②黑格尔的这一言论同样适用于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东汉时期,文学作品中的

^①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57页。

^②黑格尔:《美学》序论,第8页。

想象与先秦作品中借“香草美人”以托物言志不同,与汉赋中虚设主客以谋篇布局亦不同,它在文中呈现出作者想象中的“另一个我”,以《古诗十九首》中的代言写作最为典型。如在《涉江采芙蓉》、《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亭中有奇树》等篇中,作者化身思妇,道尽分离的忧伤。

相对于经学注重道德说教的特性而言,此期诗赋中引经据典减少,而直抒胸臆之文增多。不仅如此,士人在现实旅途中的身体之游,终于演变而成精神世界中的心灵之游。逍遥、避世思想逐渐显露,尤在汉末乱世,士人有了更为通达的处世态度,更有“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①者,对东汉一朝浩荡之“游”提出质疑,显示出疏离政治、远离政教、从容行乐的思想。这些作品也直接开启了魏晋时期的隐逸、游仙之作。

“汉代特别是中后期的文人,已经将文学与他们生活的许多方面、不是前代的文人没有遇到而是没有用文学的方式表现的方面,在实践上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了。而正是这种表现,使我们看到了他们属于世俗方面、人性方面的正常的生活内容。”^②士人的流动恰是促成这一“正常的生活内容”的文学表达的重要契机。正是士人的流动及其下行趋势,促成了士人空间视野、继而创作视野的开阔,造就了士人写作群体的生成与文章写作的繁荣,使得此期文章呈现出凡俗人生的日常书写的特点,表现为私人生活空间在文学领域的拓展,普通士子的普通情怀也因此得以彰显。这些士子原本以通经、入仕为目标,开启漫长游学、游宦之旅,然而在不断的行走之中,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携带与生俱来的地域标签,又感受着所到之地的风土人情,在停停走走中不断梳理情感、刷新思想,且倾于笔端,以文字慰藉心灵,悄然开启了文章写作的新方向,“那以社会政治为核心的综合性的价值体系悄然发生了破裂”,呈现于字里行间的是厚重、孤独与悲怆之美。

(责任编辑:陆 林)

Fall of Nobility and Rise of Literature: The Downward Mobility of Scholar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Writing History

YANG Xia

Abstract: The mobility of scholar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shows a downward trend compared with that of scholar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as follows: lots of scholars chose to study away from home regardless of their origins; places for study were extended to rural or remote areas; more scholars regarded acquiring knowledge as their objective instead of taking an official career. The downward mobility of scholar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writing groups and new changes of literary genres, hence a boom in writing articl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ith the mobility of myriad scholars and the formation of writing groups, there wer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non-practical articles characterized by the strengthening of lyrical function. Thus, literature gradually separated from histori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became independent in a real sense.

Key words: scholar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mobility; downward trend; history of written texts; rise

①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十九(仲长统《乐志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04页。

②王洲明:《汉代抒情赋的人性回归》,《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